

乾隆朝玉冊成做機制研究

吳誦芬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提 要

筆者觀察清宮刻帖活動之際，發現清高宗（一七一—一七九九，r.1735-1796，以下或稱乾隆皇帝）多方複製其御筆書蹟，因而產生如：書籍雕板、緙絲、刺繡、刻帖、玉冊等各種御筆書法衍生品。乾隆一朝宮廷命製的玉器數量，可謂空前絕後，尤其在現存文物和活計檔中，均留有大量當時所造玉冊的成品實物和文獻檔案。乾隆時期成做的玉冊不唯類目眾多，裝飾精美，常有重複製作情況，並且形制規模與應用範圍，也迥異於以往歷朝歷代。

此類玉冊的形制奠定並非一夕可就，乃是有跡可循的逐步形成。本文希望把梳目前已知的乾隆朝玉冊作品與官書、活計檔資料，整理介紹乾隆一朝玉冊的取法對象、製作演進、配裝套件，與成做單位等線索，做為乾隆皇帝以紙絹之外材質複製御筆書蹟的研究基礎。

關鍵詞：乾隆、玉器、玉冊、活計檔、蘇州織造、如意館、御製詩文、御筆書法

一、前人研究

自古以來，中國人常以玉作為天人感通的用器材質，其中造型簡樸的玉冊以玉石材質仿簡籍書冊形式琢磨而成，所載文書的歷史價值，通常遠大於本身設計造型與工藝技術的價值。關於玉冊的研究，早年學界多半將目光投注在與封禪祭誥天地禮制有關的禪地祇玉冊，¹ 以及考古發現的帝后冊立、上尊號冊與哀冊。² 最早關注清代玉冊的文章，是西方學者 Berthold Laufer 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玉器：中國的考古學與宗教研究》（*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探討作為書寫材質的玉時，提到一套順治五年（一六四八）製作的興祖直皇帝尊號玉冊，與兩套分別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與德國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für Völkerkunde）的乾隆朝玉冊。³ 其後，一九六三年 William Watson 為愛爾蘭都柏林畢蒂博物館（Chester Beatty Library）藏十五部清代玉冊撰文，簡要介紹該館玉冊。⁴

中文著作方面，直到一九八三年，方有傅樂治氏選擇性簡介畢蒂博物館藏自順治五年追尊先祖玉冊，至慈禧太后（一八三五 - 一九〇八）命琢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六種。文末統計，該館所藏十五部清代玉冊中，乾隆朝（一七三六 - 一七九五）所製者共十一部之多，為該館所藏清代玉冊之冠。⁵ 一九九五年，北京故宮惲麗梅氏在〈淺談清宮所藏 -- 乾隆玉冊〉文中，點出乾隆皇帝重複製做相同文本玉冊現象，但對玉冊僅止於介紹，並未參酌任何文獻檔案探索演進發展方面議題。⁶ 二〇〇二年，惲氏發表〈乾隆帝避暑山莊詩文玉冊概述〉，以避暑山莊相關乾隆御製詩文為中心，再次介紹乾隆時期玉冊相同文本重複製作情況。文末並以《清史稿》、《高宗實錄》等官書，簡略說明清代自順治時（一六四四 - 一六六一）開始成

1 那志良，〈唐玄宗、宋真宗的禪地祇玉冊〉，《故宮文物月刊》，9卷10期（1992），頁6-11；鄧淑蘋，〈唐宋玉冊及其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9卷10期（1992），頁12-25；周郢，〈唐宋玉冊補考〉，《故宮文物月刊》，10卷6期（1992），頁46-51；周郢，〈金篋何人探漢策——泰山玉冊出土述聞〉，《中國典籍與文化》，第四期（1998），頁112-115；張麗端，〈宋真宗禪地玉冊及玉嵌片〉，《故宮文物月刊》，17卷8期（1999），頁104-105。

2 馮漢驥，〈論南唐二陵中的玉冊〉，《考古通訊》，第九期（1958），頁89-98；孫新民，〈宋元德李后陵中的玉冊及冊匣考〉，《華夏考古》，第二期（1990），頁92-99。蔡美彪，〈巴思八玉冊兩種譯釋〉，《考古》，第10期（1994），頁943-947。

3 Laufer, Berthold.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4 Watson, William. *Chinese Jade Books in the Chester Beatty Library* (Dublin: Hodges Figgis & Company Limited, 1963.)

5 傅樂治，〈略談清朝的玉冊雕琢〉，《雄獅美術》，第153期（1983年11月），頁126-129。

6 惲麗梅，〈淺談清宮所藏——乾隆玉冊〉，《歷史月刊》，90期（1995年七月），頁22-26。

做的玉冊之制，亦概述了乾隆時期玉冊裝飾樣式。⁷此文依舊僅從實物分析，指出乾隆御製詩文玉冊的製作參考了諡冊和徽冊，但詳細參考事例亦未清楚說明。

二〇〇四年，大陸學者郭孟秀的〈滿文玉寶、玉冊研究〉一文，介紹了部分清代的玉冊和玉寶，仔細記下六件玉冊的尺寸、包裝、流傳、藏地等資訊。然僅探討清代玉質「諡寶、諡冊」，完全排除了其他封禪與御製詩文、佛經等玉冊種類，可說是集中介紹清代玉質諡冊，卻無法涵蓋所有清代玉冊種類。⁸二〇一〇年，北京故宮張廣文氏論匡時秋拍《清乾隆御制十六羅漢贊玉冊》時，也將清宮玉冊分為政務類諡冊、刻記皇帝重要文章的文冊、刻錄皇帝喜愛書畫作品的書畫冊等三類，強調清宮對玉冊的重視，可惜限於篇幅與主題，僅介紹單件玉冊，亦未論及乾隆大量命刻玉冊的現象。⁹

二〇一三年，筆者於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與考古學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會發表〈乾隆書法衍生品〉一文，主要論旨在強調乾隆皇帝大量以刻帖、織繡、成做玉冊等方式複製其御筆書法詩文。文中利用北京故宮公佈文物簡目與臺北故宮藏品，初步統計了此二館現存五百多筆清代乾隆玉冊的題材內容，同時利用活計檔資料指出乾隆皇帝頻繁指定將做好的玉冊進行刻字填金、配匣等美化工作，並以墨拓方式複製搨本發送紫禁城、圓明園、熱河等各處收藏或賞用。然此文僅止於提出初步觀察現象，論述重點局限在複製乾隆皇帝御筆書法的玉冊，並未對活計檔案資料進行編年排次等較細緻的分類處理。

同年，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王怡文氏碩士論文《乾隆朝宮廷玉器的再詮釋》，以近四分之一節篇幅，論述乾隆朝玉冊、玉版，查出部分乾隆朝玉冊的活計檔，追蹤到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即有製作乾隆御筆書法玉冊的成做記載。提出乾隆一朝留下諸多和戰爭、文學作品、宗教典籍，甚至和宮殿記事有關的玉冊作品，也利用玉冊進行墨搨等以往用於石碑上的複製行為。乾隆皇帝打破了過去玉冊多和社稷祭祀相關的傳統，將玉冊提升為記錄功業以利流傳後世的載體。王氏注意到的玉冊相關現象較為深入，但因論文主題為乾隆朝的玉器全體，對於玉冊的探討論述令人仍有意猶未盡之處。¹⁰

7 惲麗梅，〈乾隆帝避暑山莊詩文玉冊概述〉，《中國文物世界》，195期（2002年5月），頁80-87。

8 郭孟秀，〈滿文玉寶、玉冊研究〉，《滿語研究》，第2期（2004），頁82-86。

9 張廣文，〈清乾隆御制十六羅漢贊玉冊〉，《2010北京匡時秋拍》，（2010）。

10 王怡文，《乾隆朝宮廷玉器的再詮釋》，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另大陸學者李宏為氏同樣在二〇一三年出版的上下兩冊《乾隆與玉》，雖對玉冊的介紹篇幅較多，但可惜羅列的乾隆朝玉冊頁資料，多有舛誤。¹¹

綜合以上前人研究，可以得知，乾隆時期玉冊可依內容題材，約略分為禮制類、宗教類和御製作品類等三個大項：禮制類包含宗廟所用的諡冊、徽冊；宗教類包含各種宗教典籍與繪畫；¹² 御製作品類的雕琢內容，則包含乾隆皇帝的詩、文、

11 李宏為，《乾隆與玉》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

書中錯誤謹舉數例如下：

頁3-4，「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康熙在給弘曆講述儒家學說時，舉例說：『自古帝王因不學問，任彼書生訾議。朕自幼讀書，無不研究。先儒中，惟朱子之言最為確當，其他書冊所載，有不可盡言者。如云『唐明皇焚珠玉於殿前』，珠可焚毀，而玉亦可焚毀乎？』」然此文載於清聖祖，〈論大學士九卿等〉，《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四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99，頁16），卷4。原文為：「自古帝王因不學問，一任書生恣議。朕自幼讀書，如此等語亦能言也。先儒中惟朱子之言最為確當，其他書冊所載亦有不可盡信者。如『唐明皇焚珠玉於殿前』，珠可焚毀，而玉亦可焚毀乎？」，乃對大學士九卿等所做諭令，非予弘曆講述儒學之言。頁210，「《讀歐陽修從因論》白玉質，八片。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懋勤殿董誥奉旨填金。」此「《讀歐陽修從因論》」應為「《讀歐陽修縱因論》」。相關資料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三十六，〈行文處〉，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頁717：「十八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內開十二月初五日，太監胡世傑交啟祥宮現存未刻做玉冊頁持進呈覽，欽此。於本日將未刻做玉冊頁十三分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十三分內六分著交蘇州織造舒文處刻做，欽此。計開：白玉讀歐陽修縱因論冊頁一分計八片、白玉天竺五印度考訛冊頁一分計十片、白玉三傳晉假道伐虢辦冊頁一分計八片、青玉土爾扈特冊頁一分計十片、青玉國風正譌冊頁一分計十片、青玉前哨鹿賦冊頁一分計十片…於四十年…呈進…」

頁211，「《五經萃室記》白玉質，十片。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月，蘇州織造四德奉旨承做。《重華宮記》青白玉質，十片。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月，蘇州織造四德奉旨承做。」應為「《五經萃室記》」，且時間均應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承做」應為「成做」。相關資料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四十六，〈行文〉，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四日，頁638-639：「三月十四日接得郎中保成，庫掌福慶押帖，內開三月十二日鄂魯里傳旨……蘇州送到刻字白玉五經萃室記冊頁一分十片、青白玉重華宮記冊頁一分十片…交蘇州織造四德…玉冊頁著本文墨道刻…玉五經萃室記原冊十片內一片有黏…於四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蘇州送到重華宮記刻字玉冊頁十片呈進配畫交原處訖。…於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蘇州送到刻字白玉五經萃室記冊頁一分呈進填金配匣訖。」

頁211，「《涇清渭濁紀實》青玉質，一份，紫檀木匣盛裝。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二十九日，蘇州送到。《石刻蔣衡書十三經于辟雍序》青白玉質，十片。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蘇州奉旨刻字。」應為「《涇清渭濁紀實》」，且月份均應為十一月，相關資料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五十二，〈記事錄〉，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頁655-656：「二十九日，郎中五德、員外郎大達塞、庫掌福海、舒興將蘇州送到青白玉龍尾觥一件，綠玉渣斗洗二件，刻涇清渭濁紀實青玉冊頁一分，隨本文一分墨榻一分，隨紫檀木匣…持進交太監鄂魯里呈覽。奉旨…玉冊頁交懋勤殿刻簽字本文墨榻交啟祥宮祿冊頁…欽此。于十二月初一日刻字玉冊頁一分隨匣懋勤殿刻簽字呈進交寧壽宮訖。…」以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2，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行文〉，頁610：「二十五日…太監鄂魯里交：青白玉冊頁一分計十片上貼石刻蔣衡書十三經于辟雍序本文，傳旨發往蘇州照本文刻字，著造辦處配拉道堪金罩蓋匣一件盛裝，欽此。于五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五日蘇州送到…交懋勤殿刻簽字，交劉墉在辟雍安設訖。」

12 雖然傅樂治文中提到一部雍正十年（1733）以五十三片軟玉琢成，全文描金的金剛波羅密經，足以證明清宮早在雍正年間即有宗教類玉冊的成做記錄，但是其他學者所發表的玉冊相關研究文章似乎都只注意到乾隆朝所成做的佛經玉冊。詳見傅樂治，〈略談清朝的玉冊雕琢〉，《雄獅美術》，第153期（1983年11月），頁128。

書、畫等作品。

以上研究除了郭孟秀氏專論宗廟諡冊，惲麗梅氏略微提及乾隆朝玉冊形制參考了徽冊諡冊規定外，餘均將研究焦點放在乾隆皇帝御製作品類玉冊。雖然乾隆皇帝確實對於清代玉冊的製作應用做了諸多改變，但清代最早的玉冊製作，乃是承襲了漢族傳統宗廟禮制的諡冊，與宮廷敕封典制的徽冊，若對此類玉冊完全不論，則有忽略其他類型玉冊形制源頭的問題。乾隆朝成做玉冊數量極多，除了兩岸故宮的數百套藏品之外，亦常見於其他各大博物館的收藏，與近年的國際拍賣市場上。成做數量如此之大，可見當時甚受重視，但至今卻尚未有專文以檔案資料編年形式探討乾隆朝玉冊的成做演進。而早在乾隆十四年起即有成做御筆作品玉冊的記載，也使得以往學界將乾隆皇帝大量製作玉冊的原因動機，和其他種類玉器一樣，解為是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平定準噶爾及回部後，取得大量玉石原料的結果，顯得過分簡捷單純。

本文期以活計檔和官書等文獻資料，配合兩岸故宮已知玉冊作品，兼論禮制類玉冊和乾隆皇帝御製作品類玉冊，理出乾隆時期玉冊頁的取法對象、成做形制和演進發展，近期亦將撰寫另篇文章，探討乾隆御製作品類玉冊的選刻文本，並試圖為乾隆皇帝大量製作收貯玉冊的現象，找出可能原因。

二、乾隆玉冊玉版形制與封面紋飾的參考現象

目前所見的乾隆時期御製作品類玉冊，無論片數多少，尺寸大小，與是否配有盛裝盒匣、函套、木框、黃綾或其餘物品，都有基本固定的長方形玉版形狀，與封面紋飾主題。由於禮制類、宗教類和御製作品類玉冊的出現時間有早晚先後之別，此種形制上的共同特徵，實是參考了傳統上的禮制類玉冊，並且略加變化的結果，本節希望釐清其中相互借鏡模仿的關係。以下將分兩大部分，先比對清代和宋元明代禮制類玉冊的異同；接著再說明禮制類玉冊形制對御製作品類玉冊封面封底裝飾紋樣的影響。

中國傳統以玉石書寫文字溝通人神的事例源遠流長，先秦時期即有圭形、半圭形與不規則形的〈侯馬盟書〉和長方形的〈秦駟禱病玉版〉。其後所多見於祭告山川和帝后哀冊等禮制類所用者，大致上可以分為只寫或刻一行文字的窄長條狀玉

冊，和刻寫多行文字的長方形玉版。¹³

清代最早製作禮制類玉冊的記載，是《清史稿·吉禮五》「加上諡號」一節所載，清世祖於「順治元年（一六四四），進太祖、孝慈后、太宗玉冊…冊長八寸八分，廣三寸九分，厚四分。冊數十，面底二頁鑄升降龍。…凡太廟冊、寶皆用玉，色青白，冊文用驪體…」¹⁴ 繼清太宗皇太極崇德元年（一六三六）追封始祖，躬祭太廟之後，入關後的滿清統治者於順治元年為太祖、孝慈后、太宗加上諡號，並製作玉冊置放於太廟。換算成現行公制，玉冊尺寸合長 28.16，寬 12.48，厚 1.28 公分。一冊共用十片玉版，使用青白玉，封面封底刻升降龍，奠定了之後清代禮制類玉冊的基本模式。北京故宮藏，每片長 28.3 公分，寬 12.7 公分，厚 1 公分的順治五年清世祖追尊清太祖努爾哈赤（一五五九 - 一六二六）祖父覺昌安（一五二六 - 一五八三）之《景祖翼皇帝諡冊》（圖一）即遵此制。此外，現藏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圖書館，於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清聖祖（1654-1722，r.1662-1722）甫繼位時所上《清世祖順治皇帝諡冊》，雖然尺寸不明，但由圖版長寬比例不難判斷，亦是沿用了順治朝的玉版形制。（圖二）

另一記載太廟玉冊較為詳盡的文獻資料，是始修於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完成，敘事止於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的《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百三十八，管理冊、寶的〈工部·製造庫〉記載：「太廟尊藏玉冊玉寶，每玉冊計十頁，各高九寸（28.8 公分），濶四寸五分（14.4 公分），厚四分（1.28 公分），聯以黃線扁絲，上下二頁各鑄升降行龍一，滿鑄流雲。清字五頁，漢字三頁…清漢字冊文填青，徽號填金。」¹⁵

現藏於瀋陽故宮的《清代太祖皇帝努爾哈赤諡冊》（圖三），即屬此類。此冊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清宮內府遵旨鑄刻而成，原藏於北京太廟，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移放盛京太廟。冊共十片，每片單刻一面。封面封底均琢填金升降雲龍各一，餘八頁前三頁刻漢文，後五頁為滿文，冊文填青，諡號填金。各片玉版以黃絲帶串聯成冊，每頁隔以明黃織錦，冊外有明黃纏枝蓮紋錦袱，以黃絲帶捆繫，盛放於雙層雲龍紋金漆盒中。仍是長方形玉版形狀，僅寬度與厚度與文獻所載尺寸

13 李零，〈秦駟禱病玉版的研究〉，《國學研究》，第六卷（1999），頁 525-548。

14 國史館，《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冊 4，頁 2779），卷九十三，〈志六十八·吉禮五〉。

15（清），《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24，頁 341），卷 138，〈工部·製造庫〉，頁 6。

略有差異。

雖然整個清代的玉冊均以玉版為之，但記載中的明代玉謚冊尺寸規制，似乎卻與清代大不相同。《明史·吉禮五》「加上謚號」一節載：「洪武元年（一三六八），追尊四廟謚號，冊寶皆用玉。冊簡長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五分，簡數從文之多寡。聯以金繩，藉以錦褥，覆以紅羅泥金夾帕，冊匣硃漆鏤金，龍鳳文。」¹⁶可見明代帝王玉謚冊的冊簡是長寬比例約為十比一的玉條。但以北京故宮所藏明太祖與明宣宗玉謚冊為例，《明太祖青玉謚冊》（圖四）共六片，每片以四玉條拼成，每片長 24.5 公分，寬 9.7 公分，厚 1.2 公分，也就是每條玉條約寬 2.4 公分；《明宣宗青玉謚冊》（圖五）共十片，每片長 24.7 公分，寬 9.6 公分，厚 1.1 公分。亦以四條 2.4 公分的玉條拼綴而成。

在乾隆《御製文集》，〈書明列代玉冊事〉一文中，也曾有乾隆皇帝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回想「予於戊辰年（一七四八，乾隆十三年）奉藏歷代帝后像於南薰殿，並奔勝朝列帝玉冊之貯於工部者於殿之西室」之事，認為明代帝后玉冊使用條玉，有「一板四條，而又有穿，成造時豈不費琢磨，然析其條則為無用之物矣」的壞處；¹⁷可見乾隆皇帝認為，明代的條狀玉簡冊，在功能上與製作效益上不如清代的片狀玉版冊，並以為清代謚冊選擇改為和明代玉條不同的玉版，是一實用並且正面的做法。

但若就視覺效果上來看，明代玉謚冊雖然以玉條為單位，卻不是採用普通竹簡的直接串連編簡做法，而是以四條玉條為單位拼成一玉版；同版的四條玉條之間拼綴緊密，且又以版為單位，外裹黃綾，似是以玉條拼成玉版，追求視覺上與用黃綾包裹玉版肖似的效果。若從同質性的其他材質謚冊來看，出土於明神宗（一五六三 - 一六二〇）帝后定陵的木質四冊、錫質三冊，一共七組謚冊中，木謚冊每冊十版，以長 28 公分、寬 12 公分、厚 1 公分的檀香木板製成，亦用織金包袱包裹，放入金漆匣內。¹⁸由此可知，隨明神宗帝后下葬入墓的謚冊也是版狀，這使得明代玉謚冊是以玉條拼綴以仿玉版的方式更加可信。至於乾隆皇帝在所敘述「明十三帝玉冊」成造時所費的琢磨，則有可能是一種為了牽就玉料數量稀少，難以取

16 (清)張廷玉等，《明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97，頁 683），卷 82，〈志二十七·吉禮五〉，頁 16。

17 (清)清高宗，《御製文集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頁 487-488），卷 33，〈書明列代玉冊事〉，頁 5-6。

18 劉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436。

得較大的玉料來裁切玉版的權變做法。

而若從歷史演進方面來看，據馮漢驥氏考證，諡冊之制始於漢，至唐代始以玉冊入於陵中。目前考古發現的唐代哀冊，如惠昭太子（七九三 - 八一二）墓、史思明（七〇三 - 七六一）墓、唐僖宗（八六二 - 八八八）靖陵等出土者均為條狀漢白玉（白色大理石）冊。¹⁹ 五代十國南唐（九三七 - 九七五）二陵，則出土了長 16 公分，寬 7 公分，厚 0.2 到 0.3 公分的玉版狀玉諡冊與哀冊。²⁰

《宋史·輿服志六》載宋代（九六〇 - 一二七九）上尊號冊：「冊制用珉玉，簡長一尺二寸，闊一寸二分，簡數從字之多少。聯以金繩，首尾結帶。前後標首四枚，二枚畫神，二枚刻龍鏤金，若奉護狀。」也是條狀玉冊。²¹

遼（九〇七 - 一一二五）、金（一一一五 - 一二三四）、元代（一二七九 - 一三六八）玉諡冊尺寸雖無史冊記載，但清代留下吳式芬（一七九六 - 一八五六）與孫壯（一八七九 - ?）舊藏元代封后玉冊，與加上皇太后尊號玉冊搨本各一，皆刻八思巴文與漢字雙語，且均長 25 公分，寬約 10 公分，厚度不明；²² 另有旅順博物館藏元代刻「皇后升」三字八思巴文與漢字雙語玉冊，長 14.12 公分，寬 8.97 公分，厚 0.7 公分，²³ 則都是長方形的玉版冊。

傳統上玉諡冊具有條狀和版狀兩種不同的形制，南唐時期已有長方形玉版的哀冊、諡冊，元代亦已使用長方形寬版狀的禮制類玉冊，而明代帝王諡冊則是以四個玉條左右緊密拼合，用繩串連穿成一片玉版。若將圖四的《明太祖青玉諡冊》和圖一的清代《景祖翼皇帝諡冊》相比對，可以發現視覺上的明、清玉諡冊十分相似，都是以寬玉版為單位，用黃綾包縛的形式；也都在第一版和最後一版雕琢龍紋。差別只在明代諡冊的玉版是由四條玉條組成，可見清代的玉諡冊基本上承襲了明代的形制，明代的玉版諡冊形制，也在五代南唐陵中出現。

另外，在封面封底的裝飾紋樣上，乾隆皇帝的御製作品類玉冊也參考借鏡了傳

19 馮漢驥，〈論南唐二陵中的玉冊〉，《考古》，第九期（1958），頁 89-98；劉毅，〈帝王陵墓之冊、寶、志探析〉，《東南文化》，第五期（2012），頁 79-87。

20 左駿，〈溫故而知新——江蘇南京祖唐山南唐陵區出土玉冊的再觀察〉，《南唐歷史文化研究文集》（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頁 1-21。

21 （元）脫脫，《宋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82，頁 699），卷 154，〈志一百七·輿服六〉，頁 10-11。

22 蔡美彪，〈巴思八玉冊兩種譯釋〉，《考古》，1994 年第 10 期，頁 943-947。

23 古方主編，《中國傳世玉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冊三，頁 119。

統的禮制類玉冊。目前所見的御製作品類玉冊封面封底多刻龍紋，以臺北故宮所藏乾隆時期玉冊為例（表一），²⁴ 十七冊藏品中，除了張若藹（一七一三 - 一七四六）書乾隆皇帝登基前所作《九符》玉片二十四片，和錢汝誠（一七二二 - 一七七九）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玉冊》等兩件封面未琢龍紋外，其他十五冊凡所刻內容為御製詩文書法作品者，封面皆琢有龍紋。²⁵ 若要進一步以龍的數目、動作再行細分，則類目如下：

（一）、封面飾二升龍，封底飾一行龍者：

如「戊辰（乾隆十三年）秋月御臨」款的《三希文翰》（圖六），全冊共四片，內容為乾隆皇帝御筆臨帖，每片間夾黃綾一片，配有木盒，錦袱，合儲於錦匣之內。玉冊封面陰刻填金方框篆書「三希文翰」四字，左右各飾一升龍；封底則在玉版正中琢一正面行龍，無論封面或封底，背景均滿飾雲紋，下飾福山壽海。臺北故宮所藏玉冊中，封面封底屬此類者僅一件。

（二）、封面飾二降龍，封底飾一行龍者：

如「乾隆戊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孟秋月之上澣御筆」款《清高宗御筆書讀洪範青玉版冊》（圖七），全冊共八片，封面陰刻填金方框隸書「御筆讀洪範」，左右各飾一降龍，下飾福山壽海。封底玉版正中琢一正面行龍，儲於紫檀木匣內，另附兩件玉嵌飾。臺北故宮所藏屬此類者共七件。²⁶

（三）、封面、封底均飾升降龍各一者：

24 由於北京故宮所公佈的玉冊頁，除了少數已刊出圖像發表者外，皆為僅有編號、材質、品名的簡目資料，既無圖版，亦無尺寸、匣套和其他附件訊息。故本文所引乾隆時期成做玉冊仍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文物為主。

25 除了表格所列的十七冊外，另有編號為故玉 4444、4445、4446 的《清乾隆刻御筆金字長方小白玉》三片，每片分刻竹、梅、松，另一面刻〈古希詞〉、〈信天主人自箴〉和〈五世元孫膝上珍詩〉，因各以小漆盒盛裝，並非玉冊頁形式，故未收入表一中。

26 同屬此類者尚有六件，以下以年款時間排序：

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款的《清高宗御筆十全記玉版》共十片，每版側面刻有頁碼，附黃綾及木匣。

內文撰成於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的《清高宗御製書石刻十三經於辟雍序玉版冊》共六片，附木匣內，與兩件玉嵌飾。

「乾隆乙卯（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款的六片《清刻高宗御筆先聲三捷墨玉版冊》亦為此類，然封面雙降龍多加了拱壽設計。每頁玉版以絹鑲邊，裱為檀木封版的畫冊形式。

無年款《清高宗御製書兵部奏凱旋青玉版冊》共八片，玉片側邊刻有頁碼，附黃綾七片及木匣。

無年款《清高宗御製書石刻十三經於辟雍序玉版冊》共六片，附紫檀木匣。

無年款《清御製十全老人記玉冊》共六片，各鑲嵌於木框內，且有轉軸如書冊，附紫檀木座與罩匣。

如「辛卯（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孟冬月中澣養心殿御筆」款的《清刻高宗御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青玉版冊》（圖八），玉質深綠近墨色，全冊共十片，每片玉版下端側面均刻頁碼，玉版之間夾黃綾。封面與封底均以陰刻填金飾祥雲背景的一升一降雙龍搶珠紋。其餘十八面琢乾隆皇帝御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御製文，全冊儲於長方紫檀木匣內，匣蓋陰刻填金方框隸書「御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左右各飾一降龍，下飾福海，背景亦為祥雲。臺北故宮所藏屬此類者共五件。²⁷

（四）、封面飾二升龍、封底飾升降龍各一者：

如「乾隆乙巳（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秋七月御筆」款，《清刻高宗御筆經筵論青玉版冊》全冊六片。封面陰刻填金方框楷書「御筆經筵御論」，左右飾雙升龍，下飾福山壽海。封底飾上下雙龍搶珠。此類臺北故宮僅藏一件。（圖九）

（五）、封面飾二降龍、封底僅有祥雲者：

臺北故宮藏品屬於此類者僅有《清乾隆御製墨雲室記玉冊》，全冊四片，封面陰刻填金方框隸書「御製墨雲室記」封底無龍紋，僅有單一祥雲紋飾。（圖十）

由此可見，御製作品類玉冊，以使用龍紋做為封面封底裝飾為主流。根據前引文所提供的資料，順治元年的太祖、孝慈后、太宗諡號玉冊即「面底二頁鐫升降龍」封面封底以刻升降龍紋為飾。²⁸ 乾隆年間規定「上下二頁各鐫升降行龍一，滿鐫流雲。」除了升降龍紋外，還規定其餘部分填滿雲紋。明史對於玉諡冊的紋飾並未明文規定，但目前所見的《明太祖青玉諡冊》起首四版各雕一側面行龍；《明宣宗青玉諡冊》則是首尾四版各雕一龍，也都是以龍紋裝飾的模式。另外，《宋史·輿服志六》所透露的訊息，則有助於解釋玉冊使用龍紋的原因：「前後襟首四枚，

27 同屬此類者尚有：

「乾隆辛丑（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八月中澣識於避暑山莊之抑齋御筆」款《清刻高宗御筆知過堂論墨玉版冊》，封面封底紋飾、片數、頁碼、紫檀罩匣龍紋等均與《清刻高宗御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青玉版冊》相同。

「壬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長至月中澣御筆」款《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青玉冊》雖無木匣，但玉冊頁部分形制相同，封面、封底紋飾亦屬同類祥雲底升降雙龍搶珠紋。

另有「乾隆己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新秋御筆」款《清御筆再書安南始末事記碧玉版冊》與「乾隆戊午（嘉慶三年，一七九八）仲夏御筆」款《清刻高宗御筆鑑始齋詩碧玉版冊》，二冊均為十頁，所盛玉版封面、封底紋飾亦屬同類祥雲底升降雙龍搶珠紋，只是盛裝木匣除刻標題字體之外，光素無紋飾。

28 國史館，《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冊4，頁2779），卷九十三，〈志六十八·吉禮五〉。

二枚畫神，二枚刻龍鏤金，若奉護狀。」²⁹ 宋代以後或有略去畫在前後裱首的神像，但刻龍鏤金卻被後來的明清兩代沿用。此外，希望把龍紋做成「若奉護狀」，希望神明靈獸護持玉冊，使之流存久遠的這個祈求，似乎也在無形中被保存到了清代。這種情況，在清代封面陰刻填金方框標名，左右飾以雙龍的玉冊封面看得特別明顯。而乾隆時期玉冊所採用的玉版形狀，以及龍紋封面封底，皆可回溯至順治時期，以禮制類玉冊的形制為祖本。

三、清宮非禮制類玉冊的製作演進

有清一代製作玉冊，最初的出發點，和以往歷朝歷代一樣，是傳統禮制典章的一環。而非禮制類的玉冊成做記錄，據活計檔顯示，是雍正（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間，崇佛的清世宗，命內務府造辦處所成做，屬於宗教性質的五十二片玉石佛經。

相關記錄見諸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玉作資料：「五月初四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將做得燙胎合牌玉石金剛經樣一件呈覽。奉旨，照樣准做，字著戴臨寫，欽此。」可見此一玉石金剛經在正式成做之前，曾經製作模型提供皇帝參考。

同則記錄後半也註明：「內務府總管海望隨奏稱：造此所用玉石，用銀庫收貯石子內選取。若全用食糧匠役砑做，唯恐一時難得。今欲用外僱匠役砑做，約合用工價銀八九百兩，或用造辦處銀兩，或用圓明園庫內銀兩之處，請旨等語奏聞。奉旨：著用銀庫玉，其工飯銀兩，動用造辦處銀兩造辦，欽此。」³⁰ 顯示此經製作甚急，需要額外僱請工匠趕工完成，必須請示皇帝定奪。

其後，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八月的造辦處清檔記載：「二十六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日將造成玉片金剛經一部，隨湖廣石套。司庫常保呈內大臣海望，著隨諭：經套上面著配飄帶式銅鍍金箍二道，再做粧緞袱子一個包裹，欽此。交雜活

29 (元) 脫脫，《宋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82，頁 699），卷 154，〈志一百七·輿服六〉，頁 10-11。

3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雍正九年五月初四日〈玉作〉，頁 4-5。

作領催趙雅圖。」³¹

此一活計「于十年（一七三二）九月初五日做得碧玉金剛經五十二片，石匣盛，領催周維德持去，安在昌運宮訖。」³²按昌運宮為怡親王薨逝之所，此一碧玉金剛經為數一共五十二片，與前述傅樂治〈略談清朝的玉冊雕琢〉文中提到愛爾蘭都柏林畢蒂博物館藏，一部清世宗為了感念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去世的怡親王允祥（一六八六 - 一七三〇），特命內務府鑄製，雍正十年（一七三三）款的五十三片描金軟玉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玉冊，材質相近，文本相同，片數僅差一片。另所附玉冊第一頁黑白照片鐫文：「雍正十年歲次壬子九月吉旦，為吾弟怡賢親王虔誠鑄製以資其福」。（圖十一）或許即為此活計檔中的金剛經玉冊。³³

除了宗教性質的玉冊，活計檔中關於御製作品類玉冊的成做記載，最早的記錄則是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命做，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完成的《九符》玉片。³⁴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月二十六日，在皇帝對一件內有漢玉靈芝洗的洋漆文具裝法感到滿意後，「於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毛團傳旨，著將交出做樣洋漆文具呈覽，欽此。於本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白世秀將洋漆文具一分交太監毛團呈覽…傳旨…其洋漆佛龕持出，照玉經包袱式做玉《九符》一分補入其空。…於乾隆三年四月十二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白世秀將洋漆文具內的洋漆佛龕持出，今做得玉《九符》合牌樣一件持進，交太監毛團高玉呈覽。奉旨：照樣准做白玉盒碧玉經片金字，欽此。於乾隆八年閏四月二十日，將做得白玉盒玉《九符》經二十四片，七品首領薩木哈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³⁵這乾隆早期記錄中做成的白玉盒裝二十四片青玉金字《九符》經，可能和臺北故宮所藏，內文由張若藹（一七一三 - 一七四六）書小楷，朱彩刻字的白玉盒裝二十四片填金青玉《九符》（圖十二）相同，或者極為類似，將刻字玉片收納在玉盒子裡面，是現稱為「多寶格」中所盛裝的一件文玩。

3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六日〈雜活作〉，頁 518：「二十六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本日將造成玉片金剛經一部，隨湖廣石套。司庫常保呈內大臣海望，著隨諭：經套上面著配飄帶式銅鍍金箍二道，再做粧緞袱子一個包裹，欽此。於九月初六日將御片金剛經一部、隨湖廣石套一件，配做得銅鍍金箍二道、粧緞袱子一個，內大臣海望，帶領柏唐阿富拉他、領催周維德持赴昌運宮用訖。」

3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六日〈雜活作〉，頁 518。

33 詳見傅樂治，〈略談清朝的玉冊雕琢〉，《雄獅美術》，第 153 期（1983 年 11 月），頁 127-128。

34 文本見，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0，頁 7-16），卷 10，〈九符〉，頁 126-144。

3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7，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匣作〉，頁 807-810。

此後，《九符》這個文本被不斷複製，以青玉、白玉，也以催生石（淺色青金石）、青金石等其他種類的「石之美者」刻做。類似的活計還有乾隆三年正月初六起做，七年（一七四二）四月初二完成的九片催生石泥金字《九符》經，皇帝降旨要求用以往玉經配套的方式配做烏拉石套，搭配鍍金帶；³⁶ 顯示早期命做玉石冊頁所搭配的周邊配備，多半只是玉盒、石盒，和鍍金箍或鍍金帶，與現今常見罩覆在玉冊外部的紫檀木製須彌座式罩蓋匣不同。

另，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所做的青金石《九符》，則命配做松花石盒，在「司庫白世秀將現做松花石盒青金九符一件持進」呈覽後，要求「將青金九符天地兩邊做大小子母線，其外套盒面上安簽子，滿雕花紋或宋龍夔龍或西番花。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檔案記載後來選定在盒面上雕夔龍紋成做，³⁷ 此則記錄沿用了雍正時期以石盒搭配玉石佛經冊頁的做法，同時展現乾隆皇帝在刻成文本之後，方才意圖主導冊頁與盒面的配簽標名和美觀，並以搭配圖樣的方式來加以裝飾美化。

類似的例子，還有乾隆十三年成做《麻姑仙壇記》玉冊時的旨意，也是下令「上殼面應配合畫何樣簽子，下面應畫何花樣，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於本月十四日將玉冊頁上畫得雙龍簽子，下面畫得麻姑仙紙樣二張，太監盧成持去，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陽紋，欽此。」³⁸ 皇帝要求先將冊頁封面簽子，和冊頁封面封底的花樣畫樣呈覽。後來選定在玉冊封面畫雙龍簽子，封底畫麻姑仙，

3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一月初六日〈玉作〉，頁 869-870：「初六日，司庫劉山久來說，太監胡世傑、高玉等交催生石十片，傳旨做九符，用其套像玉經套做法，先做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於本年四月十七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白世秀將做得催生石片九符合牌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欽此。於乾隆四年二月十六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催生石片十片交太監毛圍呈覽。奉旨：內庭留下，交翰林寫摺，俟寫完時發出刻做，欽此。於七年四月初二日，司庫劉山久、白世秀，將催生石片十片選得石片九片，刻做得泥金字九符經一部，外配做烏拉石套，隨鍍金帶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於本日副催總達子將破角催生石片一片持去訖。」

3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9，乾隆六年五月初九日〈玉作〉，頁 769-770：「初九日，太監高玉傳現做活計呈覽，欽此。於本日司庫白世秀將現做松花石盒青金九符一件持進，交太監高玉呈覽。奉旨：將青金九符天地兩邊做大小子母線，其外套盒面上安簽子，滿雕花紋或宋龍夔龍或西番花。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於本月十六日，司庫白世秀將畫得青金九符套上花紋西番花紙樣一張、夔龍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高玉呈覽。奉旨准做夔龍，欽此。於乾隆七年四月初二日，司庫白世秀將做得青金九符一冊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另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9，乾隆六年九月二十日〈刻字作〉，頁 693：「二十日，司庫劉山久、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交御製青金九符一套，傳旨將外套簽上刻「御製九符」，下刻「乾隆辛酉（六年，1741）年製」，欽此。於本月二十五，司庫白世秀將青金九符一套刻得字樣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進訖。」

3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6，乾隆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如意館〉，頁 248-249。

方得准做。³⁹ 以上資料顯示，雖然現今所見乾隆玉冊封面多刻龍紋，且多搭配紫檀罩蓋匣，樣式相當統一，但乾隆皇帝最初成做御製作品類玉冊的封面圖文樣式其實並不固定，通常須先讓人提供樣品呈覽，再由皇帝選定樣式，方得成做。

此外，同樣的乾隆十三年，皇帝也命將青玉《九符》十一片每頁下做一軟墊，做好後如書籍般，配上雕漆匣和木胎糊文錦萬字套，並在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完成呈覽之際，再命「找配一片刻『御書九符』」⁴⁰，可見此玉冊是在刻成了十一片內文後，方才臨時起意想要加上一片刻有文本名稱的封面。

此一乾隆十三年青玉《九符》內文完成後，才加配標名的臨時插頁案例顯示，乾隆早期所成做的玉冊似乎並不重視標明頁面先後。但乾隆十五年關於《御書木華海賦青玉冊頁》的活計檔，則出現了對在玉冊橫頭加刻標明順序記號的要求：「…本年六月十七日，首領文旦交御書木華海賦青玉冊頁一冊，計六片，隨水、火、木、金、土、穀字六個，傳旨：著照樣冊頁橫頭上刻號數字，其冊頁上字俱填泥金，欽此。」⁴¹ 顯示乾隆皇帝希望在已完成的玉冊側面加刻類似書本頁碼的標記，以便側面一望可知玉冊的前後順序和上下正反，為玉冊添加了更多的書籍元素。

還有先前提及的乾隆玉冊搭配紫檀木罩蓋匣的現象，活計檔中所載，皇帝命令將玉冊配上紫檀木匣的情況有二：一種是被裝入多寶格或出外桌子內，屬於文玩性質者，例如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五月初三日首次南巡回京之後，五月初五立刻將《三希文翰》、《心經》、《五福德經》各隨紫檀木商絲匣「傳旨著入多寶格博

39 類似的例子還有《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6，乾隆十四年年七月十五日〈如意館〉，頁 592-593：「十五日副催總佛保持來員外郎郎正培、庫掌瑞保押帖一件，內開為本年三月初六日太監盧成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御臨洛神十三行隨白玉冊四片、御臨九成宮醴泉銘白玉冊頁四片、御臨玉枕蘭亭隨白玉冊頁四片，傳旨著將洛神十三行白玉冊、九成宮醴泉銘玉冊頁底面俱做，玉枕蘭亭白玉冊頁面底花樣畫樣呈覽，准時再刻，欽此。」

4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6，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蘇州〉，頁 431-432：「二十四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青玉九符十一片，內刻得字的二片，未刻完字的一片，隨字樣一冊。傳旨：將玉九符交南邊照樣刻字，每頁下做一軟墊，配一木胎糊文錦萬字套，外配匣樣呈覽，准時亦交南邊做雕漆，欽此。於十二月初二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做得合牌萬字套單匣樣一件持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樣准做，將套做木胎，滿包繅絲，面花紋變別要整的，不可露分縫。單蓋匣做雕漆的，交南邊成做，欽此。於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圖拉送到青玉九符十一片，並做得刻字白玉九符十二片，滿包繅絲面套一件，雕漆罩蓋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青玉九符仍交圖拉帶去，找配一片刻御書九符，其顏色不對些亦可，欽此。」

4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7，乾隆十五年七月三日〈如意館〉，頁 361。

古格」。⁴²類似的案例還有五月初十的《五福德經》和《多心經》⁴³、九月三十日的《玉枕蘭亭》⁴⁴。這些案例大量出現在乾隆十六年，推測或許和乾隆皇帝首次南巡有關。

另一種，則是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起，逐漸變成玉冊標準配備的紫檀罩蓋匣。乾隆十八年，如意館曾一次受命成做數件玉冊的紫檀木匣合牌樣，此即提供搭配玉冊的紫檀木匣模型，以供皇帝選擇。⁴⁵此後，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匣裱作已有旨命是：「初二日員外郎金輝、太監胡世傑交玉臨蘭亭冊頁四片隨袱子，傳旨照先做過裝玉冊頁罩蓋匣一樣成做…欽此。」⁴⁶，可見搭配玉冊的紫檀木罩蓋匣至少在乾隆二十四年即已有符合皇帝喜好的成例存在；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匣裱作活計檔中已有明確指定配匣盛裝的仿製對象；⁴⁷而到了乾隆三十一（一七六六）、三十二年（一七六七）的匣裱作活計檔均以「照先做過匣樣配匣盛裝」顯示命製的玉冊配匣有了一論即知的固定款式，⁴⁸將玉冊搭配紫檀木匣儼然已成一種模式定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見御製作品類玉冊所配紫檀木匣樣式，與圖二的禮制類

4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8，乾隆十六年五月五日〈匣作〉，頁 117：「初五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白玉三希文翰四片、白玉心經四片、白玉五福德經四片，各隨紫檀木商絲匣。傳旨著入多寶格博古格，欽此。」

4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8，乾隆十六年五月十日〈匣作〉，頁 119：「初十日，員外郎白世秀、催總德魁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白玉五福德經一冊，隨紫檀木商金銀絲罩蓋匣、白玉多心經一冊，隨紫檀木商金銀絲罩蓋……著將白玉經裝在舊出外桌子內一冊，其餘玉經……俱裝入在新傳做出外桌子內，欽此。」

4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8，乾隆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匣作〉，頁 143：「三十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御書白玉玉枕蘭亭一冊，隨紫檀木匣，傳旨，著入外桌子內，欽此。」

4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9，乾隆十八年十月三日〈如意館〉，頁 563：「初三日，副催總五十持來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太監胡世傑交：白玉三希文翰一冊隨紫檀木匣合牌樣、白玉五福德經一冊隨紫檀木匣合牌樣、白玉洛神賦十三行一冊隨紫檀木匣合牌樣……傳旨將紫檀木匣照樣用金銀絲各做一件。」

4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4，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匣裱作〉，頁 425-426。

47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6，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九日〈匣裱作〉，頁 434：「初九日郎中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青玉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冊頁一分……傳旨：玉冊頁交懋勤殿填金字，再照乾清宮現設平定準噶爾冊頁匣樣，一樣配匣盛裝……」

4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0，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匣裱作〉，頁 164-165：「十六日，催長四德，筆帖式五德江蘇州織造薩載送到青玉開感論冊頁一分……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開感論冊頁一分，先做過拉道填金罩蓋匣，一樣配匣盛裝……欽此。……六月初八日呈進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1，乾隆三十二年一月十日〈匣裱作〉，頁 72-73：「初十日，催長四德、五德將蘇州送到青玉西師詩冊頁一分，白玉寶一方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玉冊頁填金，照先做過匣樣配匣盛裝……四月十五日……配得匣……呈進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1，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十日〈匣裱作〉，頁 134：「初十日，催長四德、五德將蘇州送到青玉平定回部冊頁一分計八片，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冊頁上字填金，照先做過冊頁匣樣配匣盛裝，欽此。」

謚冊不同，也與清宮一般書籍側邊以抽取式木板為蓋，內隔托板的杉木或楠木裝具（圖十三）不同；卻多與清宮保藏佛經的配備類似，在「冂」字型罩蓋之下，搭配佛教須彌座式基台。（圖十四）此種裝具也被應用在如《御筆文淵閣記》（圖十五）等乾隆皇帝的御筆御製文章冊頁上，很可能是乾隆皇帝認為具有神聖性文本所應配備的收納裝具。乾隆皇帝將御製作品類玉冊加上禮制性的封面紋飾，並以宗教性裝具保藏，不但具有融合傳統意味，更顯示了對己身文章、書法的神格化價值提升。

根據活計檔，乾隆早期，成做玉冊的工作經常委請金玉作（乾隆二十一年以前稱玉作）。⁴⁹ 但總體來說，成做玉冊最多的單位，當屬蘇州織造。活計檔顯示，乾隆十三年以來，成做玉冊工作的重點單位已從金玉作轉移到蘇州織造。此後，蘇州織造多次奉皇命成做玉冊，一筆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十一月二十一日行文處資料，顯示蘇州已經非常具有成做玉冊的經驗，並且蘇州織造所使用的玉冊封面封底雲龍花樣也很符合皇帝心目中的玉冊理想，其文如下：「二十一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內開本月十二日太監胡世傑交：兩淮送到青白玉文王鼎坯一件筭下回殘玉，大小十塊，漢玉鑲紫檀木冠架一件。傳旨：著交啟祥宮將文王鼎坯改畫冊頁片，用餘下玉畫冠架上鑲嵌，欽此。於本日將文王鼎坯畫得冊頁二分，計二十片…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俱照樣准做冊頁。冠架仍交兩淮鹽政尤拔世處成做，冠架著速速做來，其冊頁面底上雲龍花紋樣，著向蘇州織造薩載處要來照樣成做，欽此。於三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庫掌四德等將兩淮送到青白玉冊頁二分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⁵⁰

此則活計檔記錄了乾隆皇帝命將兩淮鹽政所交文王鼎坯，改畫成兩份冊頁片後，仍交兩淮成做；但冊頁面底上的雲龍花紋樣，則特別指定必須要向蘇州織造要來，且務必「照樣成做」。可見至少在乾隆三十四年以前，雲龍花樣就成了玉冊封面封底花紋的主流，皇帝對成做玉冊的花樣規格也有確切的定見。此外蘇州織造受命成做玉冊所累積的經驗，也已足居其他成做玉冊單位的領導地位。

另外，活計檔中，嘉慶二年（乾隆六十二年，一七九七）十二月十日，曾有一次下令成做玉冊件數多達十九件的記錄，日薄西山的乾隆皇帝為求快速竣工，同時命令長蘆、浙江分頭成做，長蘆鹽政董椿負責十三分。浙江鹽政蘇楞額負責六分，「俱務於明年（嘉慶三年，乾隆六十三年，一七九八）八月內敬謹送京以備陳設，

49 嵇若昕，〈乾隆時期的如意館〉，《故宮學術季刊》，23卷3期（2006），頁127-152。

5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2，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行文處〉，頁635。

莫誤！」⁵¹此例則顯示了乾隆晚期，長蘆、浙江鹽政也具有受命成做玉冊的能力，在蘇州、兩淮成做宮廷玉器工作量已達臨界點之際，也能夠擔負起成做玉冊的使命。

《清史稿》〈禮志·上尊號徽號儀〉記載：「冊寶初制用金，康、乾時兼用嘉玉，道光後專以玉為之。」在禮制上，由於乾隆皇帝承襲漢族傳統觀念，認為「嘉玉較良金尤為寶貴」，⁵²故以玉冊為最高規格的禮儀用器，此外，乾隆時期的玉冊也成為錄刻皇帝御製作品的另外一種型式，突破了以往用於告天禪地，希求神人感通的傳統。嘉慶年間亦有成做御製作品類玉冊，例如現藏於北京故宮，嘉慶皇帝記述自己書房得名由來，與相關人事的《清嘉慶御筆味餘書室記》（圖十六）；以及說明效法乾隆皇帝，令皇子皇儲住在重華宮的嘉慶乙丑（嘉慶十年，一八〇五）款《清嘉慶御筆毓慶宮記》（圖十七），均為受到乾隆皇帝影響的嘉慶玉冊。執玉冊工藝技術牛耳的蘇州織造，也在嘉慶年間繼續承辦這類活計。⁵³

51 《活計檔》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作〉：「十二月初十日，接得員外郎福慶、祥紹押帖，內開嘉慶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奉大學士伯和、御前大臣福諭，著啟祥宮挑玉做冊十八分，配做南巡記四片，著懋勤殿寫本文，遵此。…畫得玉冊十八分，南巡記四片，共計一百四十五片…奉諭做御製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并效其體詩等十二分計九十六片，各長六寸六分，寬二寸六分，厚二分。南巡記四片各長九寸，寬四寸，厚三分。…得時俱照本文刻字填金，配紫檀木拉道填金雲龍匣座，著交長蘆鹽政董椿成做御製文淵閣記等玉冊六分，計四十五片，各長六寸六分，寬二寸六分，厚二分。…得時俱照本文刻字填金，配紫檀木拉道填金雲龍匣座，著交浙江鹽政蘇楞額成做。俱務於明年八月內敬謹送京以備陳設，莫誤！特諭。計開交：長蘆鹽政董椿成做：御製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并效其體詩等計十片、御製西師詩計八片、御製書安南始末事記計八片、御製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序計八片、御製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序計八片、御製金川平定告成太學碑文計六片、御製平定台灣告成熱河文廟碑記計八片、御製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記十片、御製開感論計八片、御製盛京賦計八片、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計八片、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計六片、御製南巡記一分計十片補做四片。浙江鹽政蘇楞額成做：御製文淵閣記計七片、御製文源閣記計五片、御製文溯閣記計六片、御製文津閣記計五片、御製九符計九片、御製九符計十三片。…於三年八月將長蘆送到刻字玉冊頁十三分、杭州送到刻字玉冊頁二分…交乾清宮…訖」。(Box No.154,P.497-499)

筆者按：目前活計檔出版品只到乾隆六十年，故此則活計檔以微卷影本之原始箱號與頁數標記。

52 清高宗敕撰，《欽定皇朝通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42-643，頁 50）卷 52。

53 嘉慶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懋勤殿大監劉安慶來說，首領徐文交：青白玉寶一方，上貼涵秋館篆書本文隨雕龍紫檀木匣一件；青白玉冊一分，計十片，上貼楷書本文；隨雕龍紫檀木匣一件，匣蓋上貼御筆國朝宮史續編序楷書本文。傳旨著發往蘇州交舒明阿照本文刻字，得時送京，欽此。(Box No.33,P.585)

嘉慶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太監劉安慶來說，首領王進忠交：白玉寶一方，玉冊一分，計十片。傳旨發交蘇州織造交舒明阿照本文鐫刻送來，欽此。寶係養心室，冊係養心室記。十月二十四日，蘇州送到刻字玉冊寶一分，進交養心室訖。(Box No.288,P.585)

嘉慶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懋勤殿大監崔進朝來說，首領王進福交：青玉冊一分，計十片，綺春園記本文。傳旨交蘇州織造交舒明阿照本文刻字送來，欽此。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將蘇州送到青玉冊頁一分呈覽，奉旨交懋勤殿訖。(Box No.12,P.583)

嘉慶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蘇州送到；青玉冊頁一分，計十片，呈覽，奉旨交懋勤殿，欽此。(Box No.217,P.583)

筆者按：因嘉慶時期活計檔尚未出版，以上活計檔均以微卷影本原始箱號與頁數標記。

據活計檔資料，除了紫檀木匣以外，乾隆御製作品類玉冊的固定配備還有玉冊的墨搨，幾乎從乾隆四十年代（一七七五 - 一七八九）起，成做玉冊大都附有提到墨搨的旨令，且多半命將玉冊送往指定地點擺放，置於皇居各處，墨搨本則交給如意館（或稱啟祥宮）裱冊頁。⁵⁴ 墨搨和玉冊往往被收置留存在不一樣的地方，這或許是現今所見玉冊和玉冊墨搨經常沒有一同出現的原因。雖然早在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蘇州織造安寧即有做好甘黃玉《御筆十六羅漢贊》冊後，「同本文、墨刻，敬謹裝盛解送」的做法。⁵⁵ 但墨搨逐漸成為蘇州織造成做玉冊完工呈覽的固定配備，時間則要晚到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以後。根據筆者統計，大抵以乾隆四十年為界，之前的玉冊成做的六十筆玉冊活計中，僅有乾隆二十一年《御筆十六羅漢贊》的和二十七年《盛京賦》兩筆記載在玉冊完成之後附帶墨刻呈進，⁵⁶ 而之後的一百六十五筆，則有七十八筆在成做完畢後附帶墨搨一併呈進。

綜合以上各點，可以得知，乾隆一朝，御製作品類玉冊的形式，大致是在乾隆二十四年左右開始固定搭配紫檀木材質的罩蓋匣，採用清宮寶藏書冊的形式收納。並且乾隆四十年後，常為完成的玉冊製作墨搨呈覽。從雍正年間以玉石成做佛經，以石盒盛裝；到乾隆十三年後將玉冊變成了乾隆皇帝個人文章書法的公布載體，並採刻簽、刻頁碼、搭配函套和紫檀木罩蓋匣等書籍編輯和收納的形式看來，乾隆皇帝似乎想要將自己的作品，藉由刻做玉冊的形式，更進一步增加價值以及不可磨滅性，讓自己的文章和書法，化作真正的「金玉良言」，用和佛經一樣的裝具保存，

54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8，乾隆四十年三月一日〈記事錄〉，頁 675：「初一日……蘇州送到……白玉刻字天竺五印度考訛冊頁一分隨本文墨搨……奉旨……填金……罩先做過罩蓋匣配匣……墨搨交如意館裱冊頁……九月二十二日……進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8，乾隆四十年七月四日〈記事錄〉，頁 699：「初四日接得葉報代來信內開六月二十七日蘇州送到縱囚論刻字白玉冊頁一分計八片隨本文……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玉片冊頁本文交懋勤殿……白玉冊頁交董誥填金刻簽字……配素紫檀木匣盛裝在養心殿安設……玉髻錦袱並冊頁墨搨交如意館將墨搨裱做冊頁……欽此。於二十九日將縱囚論玉冊頁一分配得匣呈進訖。」

5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1，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八日〈如意館〉，頁 687：「初八日……交甘黃玉一塊……本月初十日……傳旨……交蘇州……成做欽此。於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據蘇州織造安寧來文，內開為咨送事，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將原發去大甘黃玉上鋸下材料一片，在蘇呈覽，奉旨，著鋸開做冊頁片，欽此。當即鋸做冊頁八片，畫得面底樣呈覽。奉旨，冊頁面底准照樣做陽文龍，留素簽字，欽此。於四月初五日兩淮鹽政普福差人賚俸御筆十六羅漢贊冊頁本文十四張，簽子本文一條，到蘇隨即遵照本文摹臨鐫刻，今已完竣，同本文墨刻敬謹裝盛解送貴處等因前來，記此。於九月十三日郎中白世秀將送到冊頁八片隨本文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5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7，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四日〈如意館〉，頁 173：「初四日隨圍催長強錫來說，四月二十二日江蘇州織造安寧送到青玉盛京賦八頁，隨本文一冊，墨刻一冊……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仍令伊家人送往京內造辦處交如意館，將盛京賦填金……」

以求成為子孫永寶，舉世同珍的金字玉冊。

四、結論

在中國歷史上，製作玉冊具有悠久的傳統。清以前的歷代，以玉冊為封禪郊祀典禮祭祀告天的文牒，或皇帝即位天子受命的祥瑞象徵、冊命太子后妃的信物，以及刻載希望永保珍藏的寶典秘笈；⁵⁷ 清代的玉冊，由禮制類玉冊開始，形狀上選擇了南唐以來的長方形玉版傳統，紋飾上沿續了宋以來使用龍紋為封面的安排。清代的玉冊應用範圍出現了極大轉變，世宗在位期間，成做了宗教類的玉佛經冊；而之後的乾隆朝製作玉冊極多，舉凡誥封、記事、刻經、寫詩、臨書、以及畫冊等等，應用範圍之廣前所未有。在歷朝歷代都有的禮制類玉冊，以及篤信佛教的雍正皇帝下令成做宗教性質的佛經玉冊外，乾隆皇帝下令成做最多的，是其本人的御製作品類玉冊，將原本作為上告天地的玉冊，從宗教禮制人對神的向上層面，擴張到了為求留傳萬古，今人對後世，向未來預定歷史定位的宣告用途。

乾隆皇帝早年成做《九符》、《御書白玉玉枕蘭亭》等御製作品類玉冊，原本只是作為納入多寶格和外出箱子中的文玩，但之後卻讓御製作品類玉冊分享了禮制類玉冊使用龍紋作為封面的傳統，並為御製作品類玉冊安排刻簽，甚至加刻頁碼等令玉冊更像書籍的配備；甚至更進一步刻意搭配佛經常用的須彌座紫檀木罩蓋匣，似乎打算將玉冊視為另一種書籍，並且以保護宗教性經典的配匣模式，永久收存。

乾隆早年，原本尚有以青金石、催生石等石料刻製御製作品類玉冊的紀錄，但乾隆六年以後則只刻玉冊，再無他石，可見乾隆皇帝大量成做玉冊並不僅是因為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平定準回，得以取得大量玉石原料的結果，而或可能是因為乾隆皇帝承襲了漢族傳統對玉的特別重視與偏好，在平定了準回，玉料供給充足之際，遂更能大量琢製玉冊，以滿足上方所好。在玉冊的成做單位方面，乾隆早期經常命內廷作坊刻製御製作品類玉冊做為文玩，但自乾隆十三年以來，御製作品類玉冊逐漸擁有自己的特殊地位與成做規格形制後，成做的重心則轉移到蘇州織造。到了乾隆晚期，成做的玉冊數量有增無減，蘇州以外，其餘如兩淮、長蘆以及浙江鹽政，亦都曾經分擔過成做玉冊的重要任務。

57 傅樂治，〈略談清朝的玉冊雕琢〉，頁 128。

值得注意的還有，在這批御製作品類玉冊中，皇帝御筆書法的所佔比例特高。在完成玉冊之後，還製作墨搨呈進收存，甚至做為賞用物品的做法，也是一個類似刻碑，印製書籍和刊刻法帖的模式。⁵⁸ 乾隆玉冊頁的文本與書寫者，在乾隆十年前後，是將乾隆御製文交由善書臣工抄錄；到了乾隆十三、十四年，出現了刻製各種乾隆皇帝御筆臨帖的書法作品；直至乾隆二十年代（一七五五 - 一七六四）左右，才漸漸發展為結合御製文與御筆書的玉冊形式，並且採用與佛經相同的裝具保存。乾隆皇帝這種做法，和選刻文本與期望後世對其本身觀感有極大相關，而採用佛經裝具保存其御製作品類玉冊頁的概念，似乎也與其營造自身聖王意象與佛教轉輪聖王的企圖有關。本篇限於篇幅，探討暫止於此，其他部分，謹將於下一篇文章，繼續探討乾隆玉冊頁的選刻文本問題。

〔後記〕拙文發想階段，承台大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盧慧紋二位老師鼓勵；撰寫期間，又得到鄧淑蘋老師慷慨提供史料參鑒，筆者感銘在心。此文之完成，受惠於三位匿名審查人指正與修改意見，惟所有文責應究屬本人。

5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51，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二十七日〈信帖〉，頁 611-612：「二十七日，筆帖式舒慶持來信帖，內開閏五月十五日太監鄂魯里交御筆詩本文冊頁樣一冊……准時連玉料並刻字本文俱發往蘇州照樣成做，玉冊頁八片照本文刻字填金配雕龍單蓋匣盛裝，再照本文做墨搨一百分送來，欽此。……於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蘇州送到樂毅論玉冊頁一分，隨雕龍匣一件、墨搨一百分呈進。玉冊頁交寧壽宮，墨搨交軍機大臣賞用五十分，交直隸總督安行宮二十分，萬壽山、盤山、寧壽宮、香山各三分，圓明園五分、熱河五分、重華宮二分，瀛台三分，陽山二分訖。」

表一、臺北故宮所藏清代乾隆時期玉冊：

	統一編號	品名	尺寸(公分)	現貯箱號與原始編號	文本年款
1	故玉 004390N000000000 故玉 004391N000000000 故玉 004392N000000000 故玉 004393N000000000 故玉 004394N000000000 故玉 004395N000000000 故玉 004396N000000000 故玉 004397N000000000 故玉 004398N000000000 故玉 004399N000000000 故玉 004400N000000000 故玉 004401N000000000 故玉 004402N000000000 故玉 004403N000000000 故玉 004404N000000000 故玉 004405N000000000 故玉 004406N000000000 故玉 004407N000000000 故玉 004408N000000000 故玉 004409N000000000 故玉 004410N000000000 故玉 004411N000000000 故玉 004412N000000000 故玉 004413N000000000 故玉 004414N000000000	清小玉盒 (二十四片)	玉盒：長 5.4 寬 3.2 高 3.6 玉片：長 4.4 寬 2.2 厚 0.1	院 1903， 原始編號 呂-1657-17	九符 24 片，含玉匣，內文小楷，張若藹(1713-1746)書，朱彩刻。根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七，〈匣作〉，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頁 807-810，完成時間為乾隆八年(1743)。
2	故玉 003497N000000000 故玉 003498N000000000 故玉 003499N000000000 故玉 003500N000000000	三希文翰(四片)	長 26.5 寬 12 厚不明	院 2129 箱， 原始編號 天-1251	戊辰(乾隆十三年，1748)秋月御臨。
3	中玉 000316N000000000	清刻高宗御筆 土爾扈特全部 歸順記青玉版 冊(十頁)	長 24 寬 11.3 厚 0.6	古 2010 箱	辛卯(乾隆三十六年，1771)孟冬月中澣養心殿御筆
4	故玉 009113N000000000 故玉 009114N000000000 故玉 009115N000000000 故玉 009116N000000000	清乾隆錢汝誠 書「般若波羅 蜜多心經」玉 冊(四片)	長 5.8 寬 4.5 厚不明	院 2928， 原始編號 全-1278	含玉匣，內文小楷，錢汝誠(1722-1779)書。
5	中玉 000321N000000000	清刻高宗御筆 知過堂論墨玉 版冊(十頁)	長 21 寬 11.3 厚 0.7	古 2010 箱	乾隆辛丑(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中澣並識於避暑山莊之抑齋御筆。(文見《御製文集二集》卷三，〈知過論〉。)

	統一編號	品名	尺寸(公分)	現貯箱號與 原始編號	文本年款
6	故玉 001543N000000000 (10) 故玉 001548N000000000 (09) 故玉 001544N000000000 (08) 故玉 001552N000000000 (07) 故玉 001547N000000000 (06) 故玉 001545N000000000 (05) 故玉 001550N000000000 (04) 故玉 001549N000000000 (03) 故玉 001551N000000000 (02) 故玉 001546N000000000 (01)	「通鑑綱目續 編內發明廣義 題辭」玉版冊 (十片) (款題「壬寅 長至月中瀟御 筆」)	長 24.6 寬 10.5 厚 0.7	院 2184 箱， 原 始 編 號 往 -98-86	壬寅(乾隆 四十七年， 1782)長至月中 瀟御筆。(文見 《御製文集二集》 卷十八。)
7	中玉 000318N000000000	清刻高宗御筆 經筵論青玉版 冊(六頁)	長 24.7 寬 11.2 厚 0.7	古 2010 箱	乾隆乙巳(乾隆 五十年，1785) 秋七月御筆
8	中玉 000315N000000000	清高宗御筆書 讀洪範青玉版 冊(八頁)	長 21.5 寬 11.9 厚 0.4	古 2010 箱	乾隆戊申(乾 隆五十三年， 1788)孟秋月之 上澣御筆
9	中玉 000338N000000000	清御筆再書安 南始末事記碧 玉版冊(十片)	長 23.2 寬 11.5 厚 0.45	古 2060 箱	乾隆五十四年(己 酉 1789)。(文 見《御製文集三 集》卷七。)
10	故玉 006646N000000000 故玉 006647N000000000 故玉 006648N000000000 故玉 006649N000000000	清乾隆御製墨 雲室記玉片(四 片)	長 15.93 寬 8.66 厚 0.5	院 2925， 原 始 編 號 呂 -140	胡季堂(1729- 1800)書，此玉 冊與紙本〈墨雲 室記〉書法冊頁 同貯木盒中。文 見《御製文集三 集》，卷八。內 文云成於乾隆辛 亥(五十六年， 1791)。
11	中玉 000319N000000000	清高宗御製書 兵部奏凱旋青 玉版冊(八頁)	長 16.3 寬 9.4 厚 0.3	古 2010 箱	無年款。(文見 《御製文集三 集》卷十三，事 涉平定廓爾喀， 應為乾隆五十六 至五十七(1791- 1792)年間所 作。)
12	中玉 000632N000000000	高宗御筆十全 記玉版(十片)	長 22.5 寬 9.8 厚 0.6	古 0125 箱	乾隆歲次壬子 (乾隆五十七年， 1792)孟冬之月 御筆。(文見《御 製文集三集》卷 八。)

	統一編號	品名	尺寸(公分)	現貯箱號與原始編號	文本年款
13	中玉 000322N000000000	清高宗御製書石刻十三經於辟雍序玉版冊(六頁)	長 22 寬 13 厚 0.3	古 2010 箱	無年款。(文見《御製文集三集》卷九,〈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應為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1792)作。)
14	中玉 000337N000000000	清御製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碧玉版冊(六片)	長 18.6 寬 12 厚 0.6	古 2060 箱	癸丑(乾隆五十八年, 1793)。(文見《御製文集三集》卷九。)
15	故玉 001616N000000000 故玉 001617N000000000 故玉 001618N000000000 故玉 001619N000000000 故玉 001620N000000000 故玉 001621N000000000	清御製十全老人記玉冊(六片)	長 19.2 寬 11.3 厚 0.4	院 2123 箱, 原始編號 金-496-33	文見《御製文集三集》, 卷四〈十全老人之寶說〉(繡線本記年為乾隆癸丑仲春月中澣御筆(1793))
16	中玉 000320N000000000	清刻高宗御筆先聲三捷墨玉版冊(六頁)	長 24.5 寬 13.8 厚 0.6	古 2010 箱	乾隆乙卯(乾隆六十年, 1795)閏春御筆。(文見《御製詩五集》卷九十六,〈福康安奏報大剿逆苗攻解松桃之圍詩成二十韻誌喜〉。)
17	中玉 000317N000000000	清刻高宗御筆鑑始齋詩碧玉版冊(十頁)	長 22.5 寬 10.3 厚 0.5	古 2010 箱	乾隆戊午(嘉慶三年, 1798)仲夏御筆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國史館，《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1992。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二、近代論著

王怡文，《乾隆朝宮廷玉器的再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左駿，〈溫故而知新——江蘇南京祖唐山南唐陵區出土玉冊的再觀察〉，《南唐歷史文化研究文集》，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

吳兆清，〈清代造辦處的機構和匠役〉，《歷史檔案》，第四期(1991)，頁79-86，89。

那志良，〈唐玄宗、宋真宗的禪地祇玉冊〉，《故宮文物月刊》，9卷10期(1992)，頁6-11。

李零，〈秦駟禱病玉版的研究〉，《國學研究》，第六卷(1999)，頁525-548。

李宏為，《乾隆與玉》，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

余佩瑾，《乾隆官窯研究：做為聖王的理想意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周郢，〈唐宋玉冊補考〉，《故宮文物月刊》，10卷6期(1992)，頁46-51。

故宮博物院，《清史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故宮博物院，《明清帝后寶璽》，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故宮博物院，《明永樂宣德文物圖典》，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碧玉器與瑪納斯》，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特展》，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

郭孟秀，〈滿文玉寶、玉冊研究〉，《滿語研究》，第2期(2004)，頁82-86。

張廣文，〈清乾隆御制十六羅漢贊玉冊〉，《2010北京匡時秋拍》，2010。

張麗端，〈宋真宗禪地玉冊及玉嵌片〉，《故宮文物月刊》，17卷8期(1999)，頁104-105。

國立故宮博物院，《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勝概》，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 國立故宮博物院，《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
- 國立故宮博物院，《護軼有道——古籍裝潢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 國立歷史博物館，《大清盛世：瀋陽故宮文物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
- 馮漢驥，〈論南唐二陵中的玉冊〉，《考古》，第九期(1958)，頁 89-98。
- 傅樂治，〈略談清朝的玉冊雕琢〉，《雄獅美術》，第 153 期(1983 年 11 月)，頁 126-129。
- 嵇若昕，〈從文物看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231-240。
- 嵇若昕，〈乾隆時期的如意館〉，《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3 期(2006)，頁 127-152。
- 惲麗梅，〈乾隆帝避暑山莊詩文玉冊概述〉，《中國文物世界》，195 期(2002 年 5 月)，頁 80-87。
- 惲麗梅，〈淺談清宮所藏——乾隆玉冊〉，《歷史月刊》，90 期(1995 年七月)，頁 22-26。
- 曾淑娟，《乾隆皇帝的文殊·宗喀巴自覺與形塑》，嘉義：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11。
- 鄧淑蘋，〈唐宋玉冊及其相關問題〉，《故宮文物月刊》，9 卷 10 期(1992)，頁 12-25。
- 劉毅，〈帝王陵墓之冊、寶、志探析〉，《東南文化》，第五期(2012)，頁 79-87。
- 劉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嚴勇，〈緯絲乾隆《御筆墨雲室記》卷考述〉，《嘉德通訊》，第五期(2009)，頁 128-131。
- Berger, Patricia.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3.
- Chester Beatty Library. *The Chester Beatty Library*. London: Scala Publishers, 2001.
- Laufer, Berthold.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 Watson, William. *Chinese Jade Books in the Chester Beatty Library*. Dublin: Hodges Figgis & Company Limited, 1963.

The Evolution of Qianlong's Jade Albums

Wu, Sung-feng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While studying the Imperial carving modlebooks activity of Qing court,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ways to make copies of the emperor's calligraphy such as woodblock printing in the books, tapestry, embroidery, carving stone to make ink rubbing coppies, and carving jade albums, etc. Those are the derivative objects of Emperor Qianlong's calligraphy works. The Qing Emperor Gaozong (family name Aisin Gioro, given name Hongli, reign name Qianlong [1736-1795]) ruled for 60 years. During this time, he ordered the imperial artists to make the most amount of jade war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jade albums among them. These jade albums not only are in a huge quantity, but also has various styles, decorations, types, and even copies. The style and usage of these jade albums are not all the same with those other dynasties, too.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study the documents and imperial records, for getting clear how these jade albums are made, the situation of their evolution, the styles of their wooden boxes, and the places of where they were made.

Keywords: Qianlong, jades, jade album,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Workshops, Imperial Textile Factory of Suzhou, Ruyi Hall, imperial poetry and prose, imperial calli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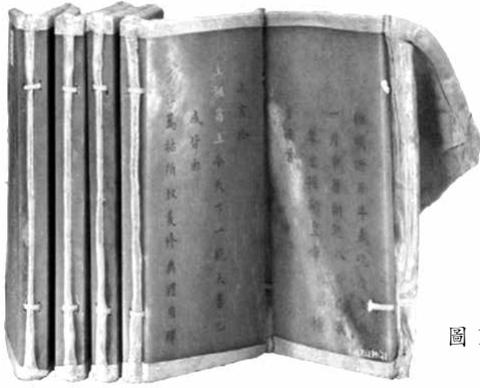


圖 1 《景祖翼皇帝諡冊（十片）》，取自《清史圖典》冊二，頁 145。
28.3 公分，寬 12.7 公分，厚 1 公分，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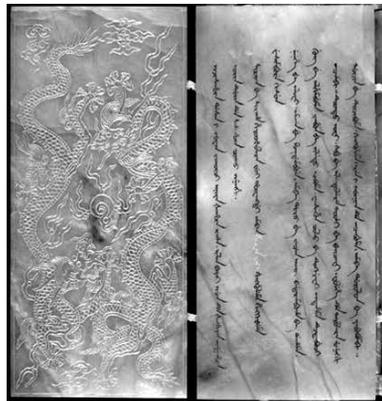


圖 2 《清世祖順治皇帝諡寶、諡冊及金匱（十片）》，尺寸不明，美國康乃爾大學圖書館藏。2015 年 10 月 12 日
取自網頁 <http://www.ourjg.com/BBS/simple/?t375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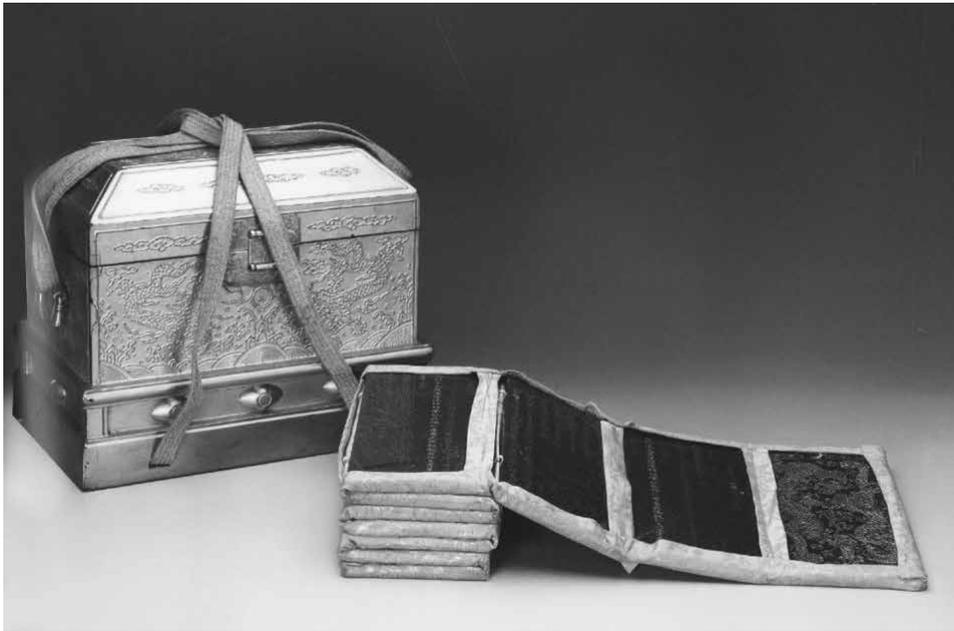


圖3 《清太祖高皇帝諡冊（十片）》，28.8公分，寬12.8公分，厚0.9公分，瀋陽故宮博物院藏。取自《大清盛世——瀋陽故宮文物展》，頁133



圖4 《明太祖青玉諡冊（六片，每片以四玉條拼成）》，長24.5公分，寬9.7公分，厚1.2公分，北京故宮藏。取自《明永樂宣德文物圖典》，頁218-219。



圖5 《明宣宗青玉諡冊（十片，每片以四玉條拼成）》，長24.7公分，寬9.6公分，厚1.1公分，北京故宮藏。取自《明永樂宣德文物圖典》，頁220-221



圖 6 《清三希文翰(四片)》，長 26.5 公分 寬 12 公分，厚度不明，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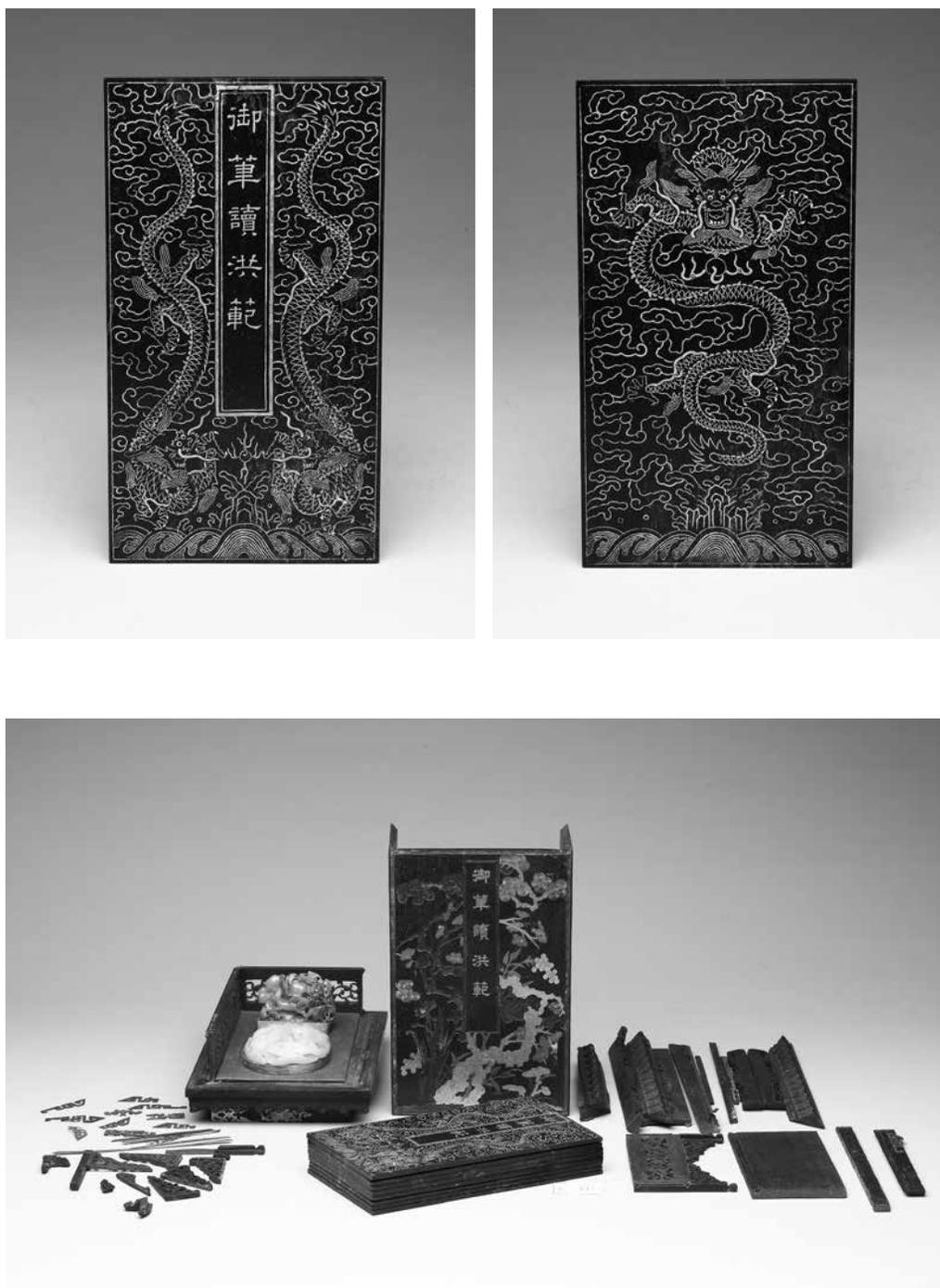


圖7 《清高宗御筆書讀洪範青玉版冊(八片)》，長21.5公分，寬11.9公分，厚0.4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清刻高宗御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青玉版冊(十片)》，長24公分寬11公分，厚0.6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清刻高宗御筆經筵御論青玉版冊（六片）》，長24.7公分，寬11.2公分，厚0.7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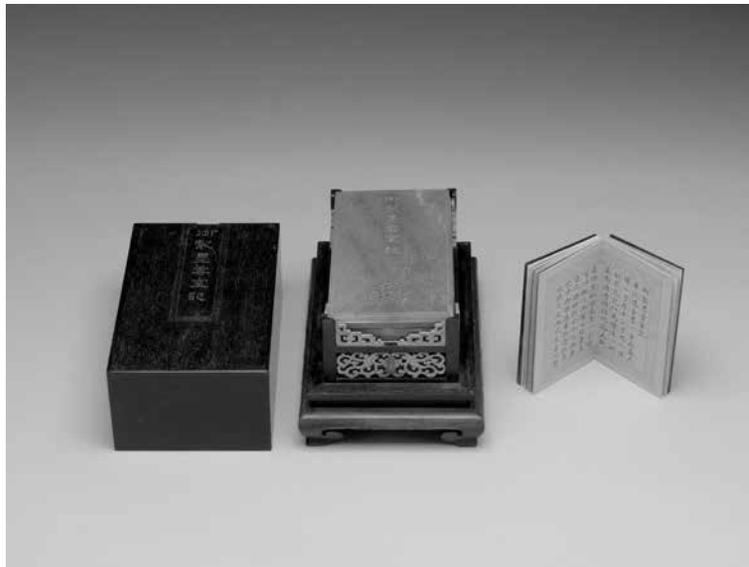


圖 10 《清乾隆御製墨雲室記玉冊（四片）》，長 15.93 公分，寬 8.66 公分，厚 0.5 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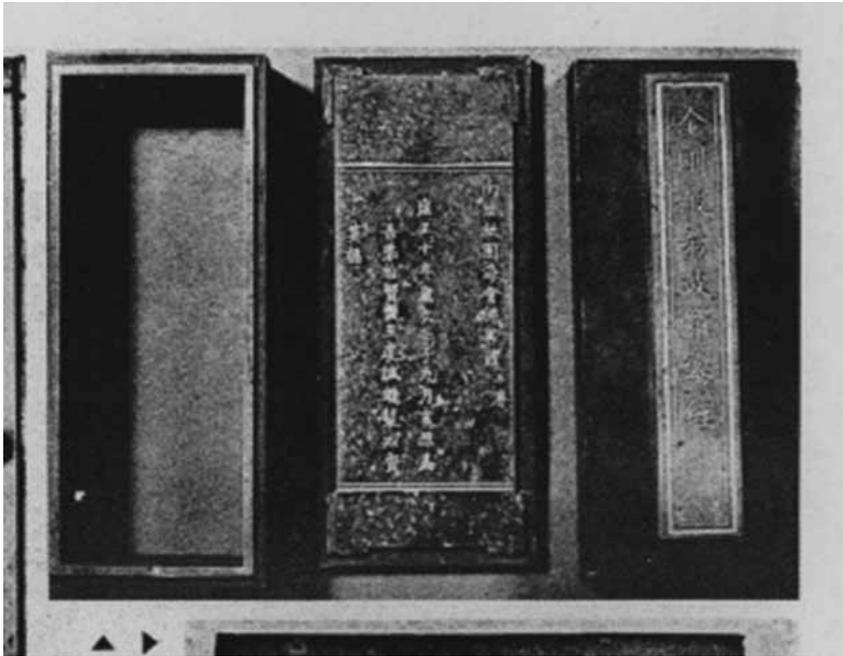


圖 11 《清雍正刻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冊（五十三片）》，長 24.0 公分，寬 9.1 公分，厚度不明，愛爾蘭都柏林畢蒂博物館 (Chester Beatty Library)，取自傅樂治，〈略談清朝的玉冊雕琢〉，《雄獅美術》，第 153 期，1983 年 11 月，頁 127-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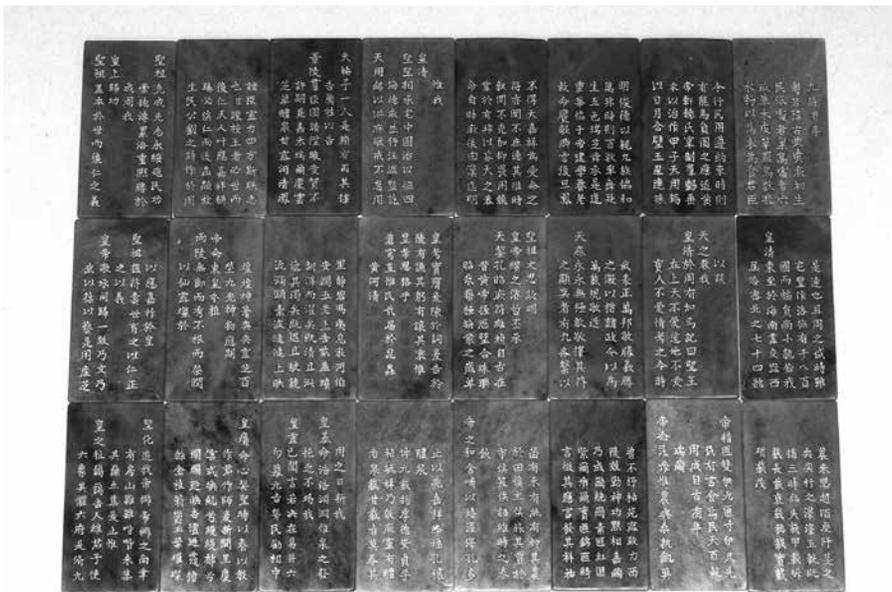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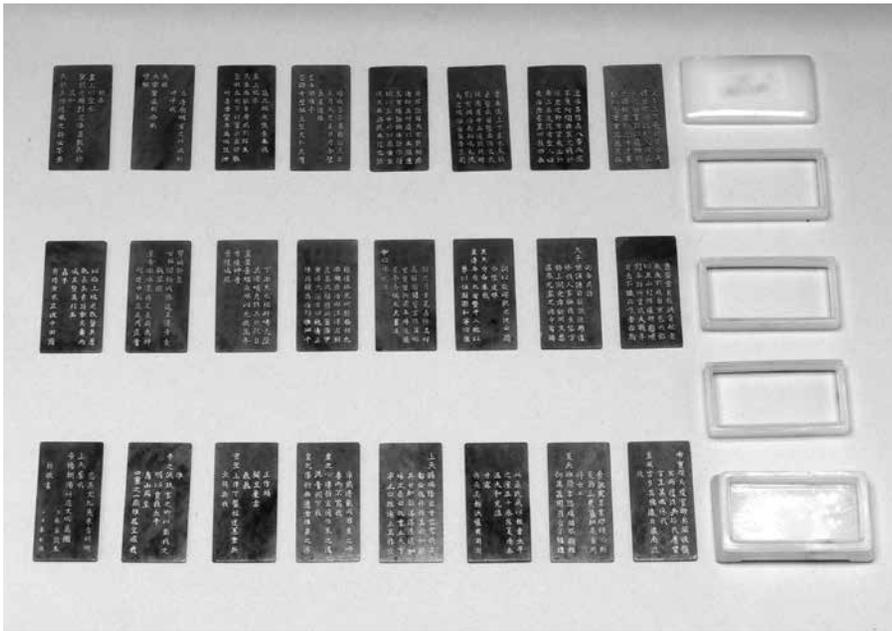


圖 12 《清乾隆刻九符青玉冊（二十四片）》，長4.4公分，寬2.2公分，厚0.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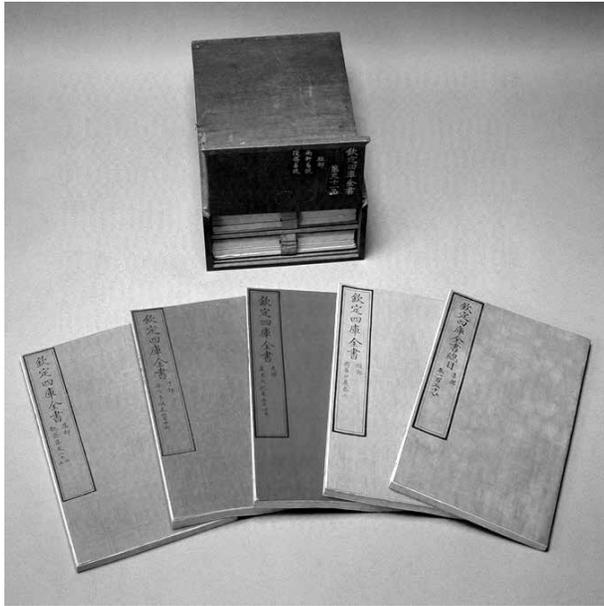


圖 13 (清)紀昀等奉敕撰，《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經、史、子、集)》，取自《故宮勝概》，頁 216。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長 31.8 公分，寬 21 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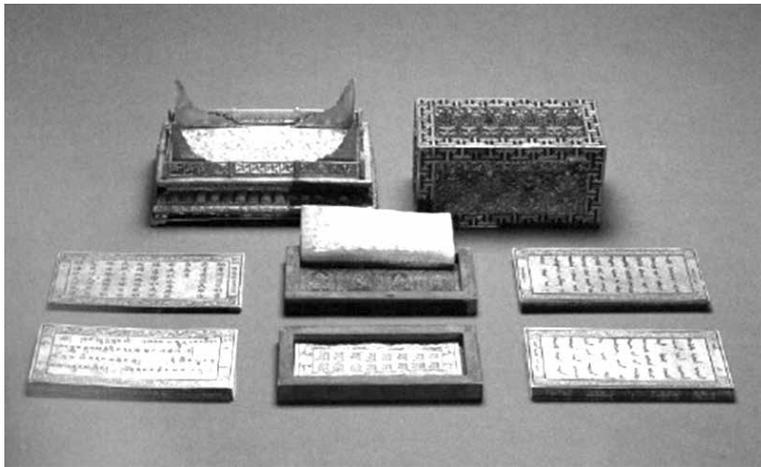


圖 14 A、《清「綠像救波佛母讚」經文附鏤金嵌石方盒》，取自《護帙有道—古籍裝潢特展》，頁 96。盒長 17.5 公分，寬 9.1 公分高 13.7 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清黑線緋絲本佛說阿彌陀經》，取自《護帙有道—古籍裝潢特展》，頁 81。盒長 34.8 公分，寬 17.6 公分高 15.3 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清高宗御筆文淵閣記》，清高宗御書本，取自《護帙有道—古籍裝潢特展》，頁 133。匣長 51 公分，寬 32 公分，高 11.2 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清嘉慶御筆味餘書室記 冊（十片）》，長 25 公分，寬 12.7 公分，厚 0.8 公分，北京故宮藏。取自《清史圖典》冊八，頁 12



圖 17 《清嘉慶御筆毓慶宮記 冊（十片）》，長 29 公分，寬 12.8 公分，厚 0.6 公分，北京故宮藏。取自《明清帝后寶璽》，頁 153